

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

史語所早期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



1936 年猛董（今勐董）趕街圖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8 期 2008.10

1935 年底的一天，雲南滄源南腊鄉的甘猛村（今甘勐）突然熱鬧起來。在這個接近中緬邊界的佤族山村附近山坡上出現了數十頂白色帳篷，許多政府官員與外國人在這些帳篷中出出入入的忙著，更有一些保護他們的武裝軍人與佤族戰士在附近活動。這時一位中年人離開營地，手中持著當時最新型的萊卡相機，肩扛腳架，走到對面的一個山坡上；他架好照像相，對著營地照了張像……。這位中年人是芮逸夫先生，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此時正參與中英滇緬邊界南段勘界活動，隨大隊人馬來到南腊。當時他攝得的這張照片（見圖 1），是 1930-1940 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在中國西南所攝得的 8,000 餘張照片之一。以上只是發生在 1930 年代中國邊陲的一個小小場景，然而它卻是當時在國內外政治、學術、科技下中國邊緣再造的一部分。



圖 1：中英滇緬勘界團隊於甘勐扎營

2007 年 11 月，也就是在以上場景發生的七十二年之後，我，作為一位史語所的西南少數民族研究者，在臨滄機場下了飛機，踏上探尋芮逸夫、凌純聲等先生學術考察之路途。因著雲南朋友們的安排，晚上我與臨滄市劉市長共進晚餐。餐後，我對市長及市府文化官員說明來意，並在筆記型電腦上展示芮逸夫等人當年所攝照片。市長等人對本所這批照片呈現的雲南舊時人物及老村落影像十分感興趣。劉市長是愛好攝影的人，他拿出一些自己的攝影作品，其中有幾張是佤族翁丁寨的照片；這個寨子，據稱是雲南臨滄目前唯一仍完整保存草頂干欄建築的佤族村落。劉市長很自豪的說，數年前他在該地工作，發現這個因偏遠而仍保存原生態的村落，下令予以保護，因而得以成為今日觀光景點。

第二日我由臨滄到耿馬。這兒是過去耿馬土司官府衙門所在。耿馬土司姓罕，為傣族土司，當年該家族曾分任耿馬、孟定等地土司及頭人，在本地至今此家族仍有相當聲望。本所芮逸夫等曾為該家族之罕中興、罕富廷等人攝像。這些照片，與當年本所研究調查者所攝的其他土司照片一樣，照片中的土司都是一派漢人地方士紳打扮，絕無今日「少數民族」意味。這些「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落差，便是在整理這些照片以及在探尋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調查工作時經常讓我深思的——我看著照片，時時想著，這時被攝影者（土司）在想些什麼？攝影者（芮逸夫等人）在想些什麼？芮逸夫等人為何要從事這些學術活動？而我，近十餘年來為何要在中國四川、雲南、內蒙等地從事田野考察，為何要從事些幾乎是「解構」本所前輩學術的學術活動？

二

歷史語言研究所最早的邊疆民族調查，應是該所助理員黎光明（及其友人王元輝）1929 年的川西民俗考察。^❶ 1933 年芮逸夫與凌純聲、勇士衡（負責測繪及攝影之技術員）赴湘西南鳳凰、乾城、永綏等地，進行歷時三個月的湘西苗族考察；此時他們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之成員。1934 年，芮逸夫與凌純聲又到浙江白門、麗水、青田一帶作畚民調查。也在這一年，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併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該所的人類學組（見圖 2）。

此時史語所受雲南省政府之邀，與該省合作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於是由 1934 年 12 月起，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為一路，往大理、保山、河口、墨江、開遠、蒙自、騰衝一帶考查邊民之生活習俗與社會；陶雲達與趙志誠等為一路，往麗江、中甸、維西等地，考查重點在民族體質、語言。



圖 2：史語所人類學組成員（左起 凌純聲、芮逸夫、陶雲達、勇士衡）

由於史語所人類學組之學者們熟悉西南邊疆，因此 1935 年受國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參與中英滇緬南段界務會勘工作。1935 年 11 月至 1936 年 4 月，芮逸夫、凌純聲等人與勘界的中英雙方代表，在軍隊護衛下一同至滇緬邊境之鎮康、孟定、耿馬、勐董（舊資料：猛董）、孟連、班洪、班老、南大、雙江、瀾滄、西盟等地考察。本所學者協助考察的重點是，探索、識別中緬邊界地區各個民族的分布。

三

在耿馬，我參觀了當地的博物館，該館便設在過去耿馬土司的官衙門裡。本所在此之前贈予該館的百來張照片被展示在館中；這對本地人來說是很珍貴的歷史記憶。當地博物館人員又陪同我尋找舊照片中的耿馬城東門，以及城外的街子，城郊的白塔。為了找尋與舊照片拍攝角度、距離完全相同的拍攝點，我有時需爬上山坡，爬上

❶ 黎光明先生的考察報告已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見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川西民俗調查記錄 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屋頂；然而當數位相機鏡頭中出現與舊照片完全相同的影像時，我心中便有無比的興奮與激動——那表示我的腳正踩在七十餘年前本所前輩站立過的土地上。下面的兩張照片，左邊彩照爲此行所攝，右爲對照的史語所藏老照片（本文以下的照片皆同）。另外，本所藏有耿馬土司及其家人多張照片，幾年前便贈予耿馬土司的後人；其中之一爲年輕的耿馬土司罕富廷站在土司官署前拍攝的照片，今日官署遺跡猶存（圖3～4）。

次日（11月22日），我僱了車一早便往孟定去，計劃由孟定沿中緬邊界一路南下到滄源，再往西盟、孟連、瀾滄，然後經普洱市回昆明。不料出發後約一小時便遇上修路，在等待期間得知滄源往西盟的路也在修路，經常堵車。所以與司機商量後，決定改變行程，將考察行程縮短在滄源到孟定之間。作此決定後，立即將車掉頭，經耿馬、賀派、勐來、勐角到班洪，再折回滄源住宿。這樣迫不得已的改變行程，反而使得此後三天收穫豐碩。因爲走向這條路後才知道，芮先生等人訪問過的村寨經常離開主要道路有一段距離，要細細探訪才找得到（見圖5）。



圖 3-1：耿馬司署舊址



圖 3-2：耿馬司署



圖 4-1：耿馬司署遺跡



圖 4-2：耿馬土司攝於耿馬司署前



圖 5：本所 1935 與 2007 年田野調查路線對照圖

這一天中午我到了勐角。由於一路上熟記舊照片上的山川地形，所以看到這個盆地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此我找到勐角壩子，以及勐角城。過去這裡是一個街子的舉行地點，附近各族群在此買賣交換農產及生活用品（見圖 6～7）。



圖 6-1：勐角壩子



圖 6-2：勐角壩子上的街子



圖 7-1：勐角城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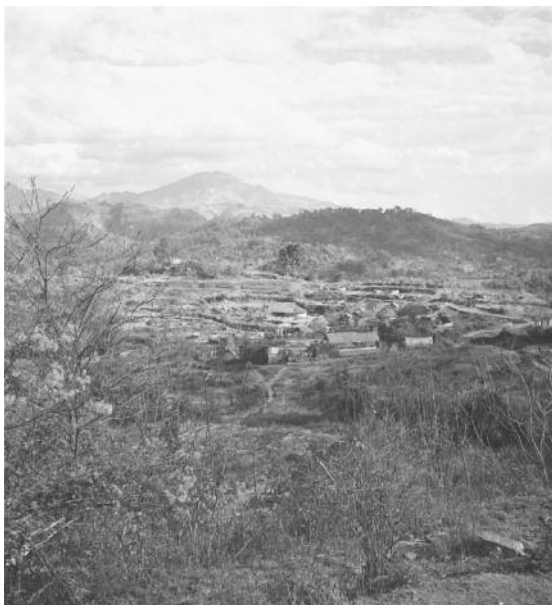


圖 7-2：勐角城

離開勐角後，我尋找老照片中的勐卡寨未著，卻途經劉市長提及的翁丁寨，但爲了趕路而沒有造訪。一路到了班洪，這是過去佤族的核心地區。本所舊照片中有一班洪王雄姿英發的照片。在班洪，我拜訪了班洪王的後人，才知道此照片中的班洪王大大有名，乃 1934 年班洪抗英事件中的主角。事實上，芮逸夫等人參與隨行的這一趟中緬邊界南段勘界之行，便是因駐緬英國軍隊在強行開採雲南銀礦，遭到佤族班洪王聯合該族各部落強烈反抗後，才有的外交解決行動（見圖 8～9）。



圖 8-1：班洪王的兒子（坐者）及其家人



圖 8-2：班洪王（1935.12）

離開班洪，已是下午四點。因明日還要由此路往孟定去，所以我們就此回頭，希望在天黑前趕回滄源縣城，也就是舊資料中所稱的猛董城。當途經翁丁時，司機建議進去參觀一下。到了翁丁寨門口，我見這村寨與舊照片中的勐卡寨有些相似，就請司機去問問這是不是勐卡寨。當地人告訴我們，勐卡寨還在山後面 10 公里。這真是意外的收穫。我們顧不得時間已晚，立刻往山裡去，不久便到了勐卡。這個村寨完全與老照片中一樣，只是房子的草頂換成了現代材料的屋頂。許多村民圍上來看老照片；據他們說，連各家的位置七十多年來也沒有變。這是一個傣族村寨，許多村中小孩仍依舊習俗在寺院習經文；本所舊照片中便有一群小僧侶的照片。這時，幾個可愛的小僧侶帶我們去看寺院舊址，於是我也爲他們照了張照片。這一天我們抵達滄源已是晚上八點多了（見圖 10～11）。



圖 9-1：凌純聲與佤族頭人們



圖 9-2：凌純聲、班洪王以及參與勘界的官員



圖 10-1：現在的勐卡寨



圖 10-2：勐卡寨全景



圖 11-1：勐卡寨的小僧侶



圖 11-2：勐卡緬寺僧侶

滄源縣城，也就是舊資料中的猛董城。1936年2月參與中緬勘界的團體曾在城外紮營。芮逸夫等人在滄源拜訪了當地土司，逛了街子，攝了不少照片。我在此先尋訪舊照片中的猛董街子、猛董城；因城背後的山形勢特別，所以很容易辨識。然後，我又找到本所舊照片裡中緬勘界團體的紮營位置。在當地人的指點下，猛董土司的官署位置也找到，但官署建築已不復存在（見圖12~14）。



圖 12-1：今日滄源縣城（勐董城）



圖 12-2：駐紮勐董之勘界營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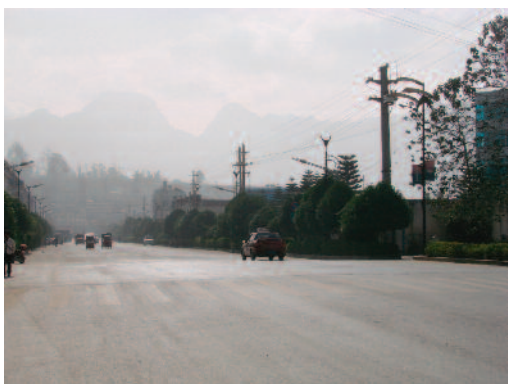


圖 13-1：勐董街子今景



圖 13-2：勐董街子



圖 14-1：勐董城今景



圖 14-2：受戰火波及之勐董城

在滄源停留到中午十一點多才離開；原因是爲了等城中的晨霧散去才好照像。雲南許多位在盆地上的城鎮都一樣，每天早晨十點以前都籠罩在霧氣中。下午兩點多，我重回昨天走過的路，經過勐角，到了控角。司機告訴我，控角可能就是我手上舊照片中的「昆角」。我們在路邊問了幾個人，終於弄清楚路邊的控角是新的村子，而本所舊照片中的「昆角」是老寨子。我們依指示前行並折轉進入一條山間小路；因路愈走愈窄，我幾度要司機設法將車掉頭回去，但司機卻對於這「對老照片」的工作產生極大的興趣，堅持一定要找到昆角老寨。終於在山中繞了二十多分鐘後，我們來到一個寨子。走上寨子較高的地方，我對著老照片，依著山勢調整自己站立的位置，照了下面這張照片（見圖 15）。在這裡，我們也見到本所照片中昆角頭人的後代。

離開昆角後，不久我們來到南腊鄉的甘勐。勘界的團隊曾在這兒紮營（見本文圖 1），隨行的本所人類學組前輩在此訪問村寨，照了一些照片。因爲舊路在上方，目前爲叢林所遮蓋，所以我不容易到相同的位置照下他們當年的紮營地點。然而我卻發現，當年芮逸夫曾走到一個山坡上，向兩邊各攝取一張山景照片；我也在同一位置照了兩張照片（見圖 16 ~ 18）。



圖 15-1：當代控角（昆角）寨



圖 15-2：昆角寨



圖 16-1：南腊甘勐



圖 16-2：南腊甘勐的班老王家族



圖 17-1：甘勐附近山脈



圖 17-2：甘勐附近山脈



圖 18-1：甘勐附近山脈



圖 18-2：甘勐附近山脈

離開甘勐後，我們沿著南丁河谷進入孟定。孟定是個較大的城。第二天（11月24日）早晨，在本地政府文史單位人員協助下，我在孟定城中探訪孟定土司府、孟定測候所、孟定街子等本所舊民族照片所見的建築景物。本所前輩對於雲南各地的「街子」特別感興趣，在每個地方他們都拍攝人們「趕街」（到街子上作買賣）的照片，在孟定也不例外。我在孟定的這一天正遇上「趕街」的日子，所以我攝下了下面這張照片（見圖 19～20）。

然後，出城尋找永相寨——中緬邊界探勘考察團曾在此駐紮。幾經打聽才得知，這村寨現在稱允相村，離孟定不遠。我在允相村拍照；同樣因為早晨霧氣重，照像效果不好。原先，我找不到芮逸夫等人在此拍照的確實地點，正要離去時，縣府人員建議我去看看本村有名的一對「龍眼睛」。於是我們隨著領路的村民走到村子的一角，去看「龍眼睛」，那是路邊的兩塊大石。站定後，突然我發現這兒就是本所人員七十二年前拍攝村寨照片的地點之一。我也發現，其實本所的那張舊照片中便有「龍眼睛」（見下圖 20-2），過去我未注意。更有趣的是，在來的路上村上老人們對我們說，以前人們說這是一隻龍眼睛、一隻龍角，現在不知為何大家都說是一對龍眼睛。我們仔細研究了本所的舊照片，原來右手邊的石頭過去是尖的一端朝上，不知何時被翻轉過來成為尖端朝下，可能因此「龍角」成了另一隻「龍眼睛」（見圖 21）。



圖 19-1：今日的孟定街子



圖 19-2：孟定街子



圖 20-1：凌純聲（左一）、芮逸夫（左四）攝於孟定臨時測候所前。



圖 20-2：芮逸夫攝於孟定司署前



圖 21-1：照片中有與右圖相同的遠山，以及左邊的「龍眼睛」；右邊的「龍眼睛」石頭為屋瓦所遮蔽。



圖 21-2：永相寨及「龍眼睛」

離開允相村之後，我們往南丁河邊去，希望找到當年中、英大批人馬渡河的嘎勒渡口。可惜的是，時間不多，而河岸又長，無法細細打探。這幾天我走的方向，與當年芮逸夫他們走的方向相反。他們先到鎮康，渡過南丁河到孟定，而後到耿馬停留數日。然後再回孟定，由孟定經甘勐、班洪、南大（在今緬甸境內）等地到勐董城（滄源）。由於已託人買了下午由耿馬到臨滄的車票，只好離開孟定回耿馬。

11月25日，我由臨滄飛抵昆明，結束了這一趟考察之行。

四

芮逸夫等人在1936年4月結束中緬勘界考察之行後，返回南京。1937年抗戰軍興，這年秋天，史語所先遷至湖南長沙，第二年春（1938）又遷昆明城內，9月再遷到昆明北郊的龍泉鎮棕皮營村、龍頭村等地。在這兒暫時棲身兩年後，又因戰火逼近，1940年秋，史語所遷於川南的李莊。此一時期芮逸夫先生等人的民族調查工作並未中斷。1939至1940年間，芮逸夫又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岩、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進行貴州苗族調查。在李莊的時期，1941年芮逸夫、凌純聲至川西馬爾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與羌族考察。^②

由1934年與雲南省政府合作的民族考察，到1941年的川康考察，這八年中凌純聲、芮逸夫等人可說只是「走馬看花」式的探訪，並未有深入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當史語所在川南李莊住定後，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芮逸夫與胡慶鈞到川南的敘永進行苗族考察——這是芮逸夫、凌純聲在1933年的湘西苗族考察之後，史語所學者另一次較具人類學意義的一次田野考察。

^② 參與這次考察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的馬長壽先生。後來，只有馬長壽持續專注於康藏地區的研究而頗有著述。

五

臨滄之行，事實上是這一年我探尋本所人類學組前輩足跡的最後一段行程；在此前一週，我已造訪了四川李莊、敘永、昆明龍頭村等地。

在訪問四川李莊的史語所舊址之後，11月16日早晨，我在宜賓坐上長程汽車往川南的敘永。敘永，這是一個近年來我極熟悉的地名，爲了出版芮逸夫先生的《川南苗族調查日誌 1942-43》，我一遍一遍的辨識其手稿字跡，考證其中所記的一些詞彙。一路上，我望著車窗外的農田、房屋、景物，努力想像七十餘年前本所前輩所見的景像。偶然見到似曾在芮先生的田野日誌中出現過的地名，便感到十分親切。

然而一開始，敘永之行對我而言卻不親切。首先當我在車上瀏覽窗外及沉思時，手機被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人扒走。接著到了敘永後，要來接我的人沒來，可聯繫的人又都找不到；由於我的手機沒了，他們也聯繫不到我。折騰三個小時後，終於我到了敘永民族宗教辦公室。我拿出芮逸夫敘永田野日誌的稿本，向本地人請教其中一些我不明白的詞彙，大多不得要領。我決定第二天到鄉間走走，希望能找到芮先生曾造訪的苗族村寨馬家屯。晚上，又有一件事頗讓我沮喪；整理帶來的照片時才知道，芮逸夫拍的馬家屯照片我只帶了兩張。

第二天，壞運氣還沒完，一早便下著雨。據我的經驗，這樣的天氣山路狀況很差。然而我僱的車還是來了；同來的是民宗辦陪我下鄉的苗族侯開珍女士。車在泥濘不堪的狹窄山路上繞行約一小時，抵達山間的馬家屯。這是一個散居村落，農舍散布在廣大的低丘淺山之間。這樣的聚落，這樣的天氣，真不知該如何進行探訪？侯女士找來了幾位附近的村民，他們都認不出照片中的景物，也沒聽過從前有「中央」的人來過這裡。就在我們不知該如何繼續考察時，一位村民建議，當地有一位老人很有學問，剛去世幾年，他兒子或許從父親那聽過一些事。看看他所指的農舍還不太遠，所以我們就試試這個不算是線索的線索。

在雨中走一段泥濘的山道，我們找到那戶人家。主人聽得我的來意後，十分激動；他說，他父親古元生，生前最愛提及的往事便是曾經跟隨芮逸夫先生學習。「古元生」這名字——便是一再出現在芮逸夫田野日誌中的一位本地苗族青年。1943年3月6日至4月14日芮逸夫在馬家屯作考察，古元生爲他提供本地文化習俗資料，同時古元生也跟芮先生學苗文（一種新創的拼音文字）及珠算。古元生的兒子還告訴我們，芮逸夫當年就住在他家老房子裡，那老房子現在還在。於是我們在古家人的帶

領下，又走上一段山路，來到古家的老房子前。我站在房前空地上往四周望，還來不及與前來打招呼的古家人見面，便驚然發現我手上那兩張照片便是站在這房前空地上照的。一張是往右邊拍攝，芮逸夫拍的是一位在田中工作的男人，背景是較高大的層疊山巒；另一張往左邊拍攝，拍的是一位苗族婦女背著背兜，旁邊還有一小女孩，背景中有一尖山。兩張照片的景像都在我面前。甚至比對舊照片中田邊的護牆砌石，石頭的大小形狀都與今日所見相同；這真是神奇的經驗（見圖 22～23）。

當天下午回到敘永，搭車回成都；一路堵車，足足花了八個小時。晚上一點半終於抵達住宿的酒店；最後一件倒楣事是，出租車司機找零錢時給了我一張伍拾元偽鈔。無論如何，這一天找到芮先生的田野住處，找到古元生的後人，一切都算是好運。



圖 22-1：右邊照片之今景



圖 22-2：雨中做田事（芮逸夫住處右側）



圖 23-1：右邊照片之今景



圖 23-2：婦人送飯（芮逸夫住處左側）

六

凌純聲於 1929 年在東北從事田野考察，產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芮逸夫、凌純聲於 1934 年到湘西考察，合著《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芮逸夫在 1942 至 1943 年所進行的敘永考察，留下其與管東貴合編的《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1934 到 1941 年之間，芮逸夫、凌純聲兩人在南方與西南中國邊疆到處奔走，他們調查的族群，以當時所使用的族群名稱來說，包括畬人、民家、擺夷、麼些、猯黑、卡佯、阿佯、佯喇、戶漢、古宗、樸喇、儂人等三十餘種。然而除了所攝照片以及蒐集的少數民族文書、文物外，他們並未留下任何可歸類於「人類學民族誌書寫」的田野日記、雜記、報告；這段時間，他們所從事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族學工作？

後來在 1941 至 1946 年間，芮逸夫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西南民族與中國國族的文章——〈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中華國族解〉、〈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再論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這些著作，乍看來雖與「人類學」或「民族學」無關，但卻表現他多年來從事民族調查與研究的一種最終關懷——建構中華國族之內涵，並刻劃其邊緣。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他與凌純聲先生等人，1934 至 1941 年間在雲南、四川所從事的民族考察之意義：舊帝國時期西南之非漢族群是被轄控於帝國邊疆的「異族」，而經近代「國族邊緣再造」後成為中國國族內的民族成員。凌與芮等人的工作與論述，後來成為「科學化」中國民族分類、識別的先聲。

舊帝國時期的「四裔」邊疆是模糊的。然而在近代國族主義之概念下，國族國家卻有明確的邊界；它既是國家邊界也是國族邊界。史語所人類學組之學者們參與中英滇緬邊界南段勘界之行，也可由此得到理解。另外，1940 年史語所人類學組學者曾受國民政府行政院之委託，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由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施行。這是透過學術研究、考訂，將所有歷史上對西南各非漢族群帶有污辱性的稱謂改正過來；如將猯、獠、猯羅等帶「犬」字邊的族名，更正為帶「人」字偏旁的僛、僛與保羅。雖然此與 1950-1960 年代中國所識別、命名的少數民族族稱有些差別，但我們從華夏邊緣的長程歷史變化看來，這的確有劃時代的象徵意義——過去在舊帝國之下受歧視的、被視為非人的邊緣「蠻夷」，被轉化為國族內具有國民人格之「少數民族」。這個《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顯然主要出於芮逸夫先生之手，但貢獻於此時代變化的當然不只是芮逸夫或史語所人類學組，而是那一時代所有從事於邊疆民族與歷史研究的學者。

今之人類學者常責怪芮逸夫先生等人忽略當時的人類學理論，這不但毫無意義，也對西方人類學之方法、理論缺乏反思，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之中國國族建構之歷史與人類生態意義更缺乏認識。在那國族主義當道的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建立一個知識體系由歷史、文化、體質、語言等方面來說明中華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並說明他們間的一體關係；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等提供了建立此知識體系的工具。芮逸夫、胡慶鈞在川南敘永一方面從事少數民族之語言、文化考察，一方面經常受邀至地方政府、學校作「中華民族之意義」、「種族平等之意義」這一類主題之演講。又有一天早晨，芮逸夫讀了《國民政治教本》之後，又讀 Charles Wagley 所著 *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³ 這些行動，都顯示在那時代民族學、人類學知識與國族建構並行而不悖。

至於這些作為的歷史與人類生態意義，我們由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這一舉動便知道，至少，相對於將夷戎蠻狄鄙視為「異類」的華夏認同來說，近代中國國族建構及相關的華夏邊緣再造是有其正面意義的。一位曾短暫服務於史語所的學者，黎光明，其事蹟更可以說明此國族邊緣再造工程不只是在學術、民族層面，更在於政治、社會層面。1929 年到川西考察民俗的黎光明，在考察結束後不久便離開史語所，投身於教育與軍政事業。1946 年，當年與他同往川西考察的王元輝受命整頓川康地區軍政、民政，黎光明也因此擔任靖化（今四川阿壩州的金川縣）縣長，兩人在此的主要任務是掃煙除惡。黎光明任縣長未久，便設宴伏殺當地掌控鴉片買賣的袍哥頭子杜某。以當時之邊區局勢來說，黎此舉幾乎是有意以身殉道。果然，當日袍哥黨羽便攻入縣府，黎遭殺害，並受曝屍之辱。黎光明與王元輝在 1920 年代的川西民俗考察之行，1940 年代他們在同一地區的軍政活動，可以說與凌純聲、芮逸夫等人的邊疆學術事業一樣，都是近代中國國族邊緣再造的一部分。

³ 參見芮逸夫，《川南苗族調查日誌 1942-4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1942.12.10 及 1943.1.26 之相關內容。Charles Wagley 所著 *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 出版於 1941 年；至少在 1942-1943 年芮已在閱讀此書，可見芮先生非常注意西方人類學的新作。